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

彭迪先
传略

王筑 著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5.3

K825.3
43

(P111.12)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
彭迪先传略

王筑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B 541701

责任编辑 谢乐如

封面设计 穆志坚

彭迪先传略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市光华村)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065 字数 24 千字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书号: ISBN 7—81017—094—5/K·3

定价: 0.65元



彭迪先近照

前 言

为数众多的读者极想获知老一辈经济学家彭迪先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斗争的全貌。由《经济日报》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第二集中的《彭迪先传略》一文，对此有扼要而翔实的评介，但该书印数较少（仅二千册），难于满足读者的愿望。本社应读者的要求，并取得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版权转让，特将该文抽出，经作者王筑同志作了必要的补充，现印为单行本，以飨读者。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8年7月

治学务求真知

斗争坚持不息

抉择和向往

彭迪先原名彭伟烈，1908年生于四川眉山县。

彭迪先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传播，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高涨的时代。1921年，年仅十三岁的彭迪先为了开拓视野，寻求优良的学习环境，毅然离开家乡去成都求学。当时成都最好的中学是成都高等师范附中，彭迪先以同等学力考入了这个学校。

成都高师的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创始人之一的吴玉章。在他的影响下，学生进步思想增长较快。彭迪先所在附中第八班中就有不少先进的青年，杨尚昆就是其中突出的一

位。这里的学习与生活使他呼吸到政治上的新鲜空气，形成了他思想上的进步倾向。这个学校的教育制度很严格，对学生要求高，彭迪先在各科的学习上都刻苦踏实，循序渐进，务求真知。在这个四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里，他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1925年，彭迪先中学毕业后，去北京在宏达学院温习功课。当时中国是一个既贫且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转弱为强，两个亚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彭迪先抱着“读书救国”的愿望于1926年冬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成城学校、东亚学校学习，目的是掌握语言工具，作好升学准备。

其时，世界经济危机即将爆发，各国经济动荡。触目惊心的现象使他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能振兴与否，最基本的问题是经济。这样，他就立下了研究经济科学的志愿。1929年春，他考入了东京庆应大学预科（三年制）。

彭迪先走上了学习经济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不用说，日本教师是使用日语讲课，对中国留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门

外国语，而庆应大学还规定每周要教九小时的第一外国语（英文）和四小时的第二外国语（德文）。外国语和高等数学等课，课前要预习，上课要抽讲抽做题，课后要整理笔记、做作业，同时还有应接不暇的小考、大考。学习生活之紧张艰苦确实异乎寻常！面对这样的困难，他的办法是起早睡迟，迎头赶上，苦战攻关。三年后，1932年2月，他终于以优良成绩毕业于这个大学的经济系预科。

彭迪先又面临抉择了。按照庆应大学的规定，根据他的优良成绩，可以不经考试而直升庆大本科。庆大是一所名牌大学，经济系的培养目标是经营管理人才，日本财经部门的负责人、财阀、公司经理多出于庆应。要是换了别人，直升庆大确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但彭迪先却“士各有志”，不想把自己塑造成成为资产阶级的经营管理人才，尤其使他不满意的是，庆大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在课外抽时间自学。彭迪先根据早已形成的思想倾向，果断地放弃了直升庆应大学本科的机会。他选

择了另一所具有不同特色的九州帝国大学。1932年春，他经过极其紧张激烈的入学考试，进入了这所著名大学的经济系本科。这使他在前进道路上越过了关键性的一步。

进了九州帝大，他满意地接触到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浓厚的学术空气。经济系教师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造诣较深者大有人在。学校自由讲学；选修课很多，不拘年级，可自由选读。在这样的条件下，彭迪先就尽量选读自己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以极大的努力提前一年读完大学本科毕业所需要的全部学分，利用最后一年时间，全力以赴地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这就为他以后进一步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35年2月，彭迪先在九州帝大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而与日本同学土岐强^①一起留作帝大经济系助教。中国留学生任九州帝大助教的，他是第一个。帝大教授波多野鼎在他的《现代经

^①土岐强后来任日共中央书记。1961年以《赤旗报》总编辑身份，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济学论》中文版（彭迪先译）序言中写道：“中国留学生之任经济科助教者，实以彭君为嚆矢，由此足证其学识、品格如何为大学所器重也”。

在任助教的同时，彭迪先又升入本校研究院作研究生。在这期间，他十分关心国内经济学界的动态。三十年代初，国内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特别是边际效用学说盛行一时，几乎垄断了经济学界。为了力挽狂澜，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传播，他把波多野鼎教授所著《现代经济学论》^①一书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国经济学界最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了系统的介绍和剖析。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五光十色，一般人不但不能予以鉴别，就连它们的来龙去脉也弄不清楚。该书论述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由门格尔奠定主观主义经济学基础，到庞巴维克达到顶点，接着由克拉克及马歇尔加以折衷而转向客观主义经济学，最后由熊彼特尤其是卡塞尔发展，确立

①（日）波多野鼎：《现代经济学论》，彭迪先译，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了客观主义经济学。它使人们对现代资产阶级学说的源流脉络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是一部既有学说介绍，又有分析批判，在当时不多见的评介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著作。此外，彭迪先还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几篇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论文，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传播初期，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7年初，彭迪先毕业于研究院时，在日本潜心致志，锲而不舍，已是八年了。他治学得力于脚踏实地，既有勇猛奋进的精神，又有循序渐进的恒心。他主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也不放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流派的深入研究。至此他在学术上趋于成熟，中国经济学界增加了一位与资产阶级学派相抗衡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救 亡 与 写 作

正当彭迪先一步一步勇攀学术高峰，不断取得成就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民族

存亡的紧急关头，他激于爱国热情，毅然放弃了学术研究的优良条件，谢绝了帝大教授们的挽留，在硝烟弥漫中，历经艰难险阻，奔返祖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抗战前途重要问题之一是，日本经济力量究竟怎样？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敌强我弱对比是否会有变化？消长之势又将是怎样？彭迪先感到，这是全国人民所渴望了解的，只有让全国人民充分了解这点，才有利于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他在日本动身之前，就留心收集了不少的有关日本经济的资料，回到祖国后，他行装甫卸即根据这种客观要求着手写书。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心理危机，他们慑于日军的强悍，对抗战必胜没有信心。当然也有人提出日本经济难乎为继的看法，但多泛泛其辞，既缺乏实际材料，又很少系统分析。怎么办？这就需要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洞察敌方经济的长处与弱点，通过分析，论断出其强弱之点的变化和矛盾发展，有说服力地得出敌人整个国力必然由强到弱的结论。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

下，他及时写出《战时的日本经济》一书。作者在书中写道：日本战时经济“只有局部的、片断的统制，而无全体的综合的统制。这样，某一个经济政策不能与别个经济政策并立，而第三个政策又妨碍别的政策，使其丧失效果。”作者进一步详细分析了日本国内各部门各方面的矛盾所在，有力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意欲通过统制来加强经济的打算，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会使经济困难越加严重，矛盾越加尖锐。本书在结论部分精辟地指出：“这些困难随着日本战时经济的进展，只有增加而无减少之理；这些矛盾随日本战时经济统制的强化，只有尖锐化而无缓和下去的道理。本来，我国的抗战已使日本经济的种种矛盾越加深化，此后我国如坚持抗战到底的长期抗战政策，则日本战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必将越加接近迫切，终于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军事冒险遭受致命的打击；经济的破产将使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一切机构毁灭无余”。这本书满足了当时全国人民急需了解日本经济内情的渴望，有助于抗战必胜信念的坚持。

民主斗争的开始

彭迪先归国一年后，1938年9月经老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推荐，应西北联合大学之聘，去陕西城固任政治经济系教授。但他到校不久就遭受国民党的迫害。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新上台当教育部长，为了镇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进步师生，竟然任命一个不学无术的C·C派党棍张伯海接替许寿裳（鲁迅好友）为法商学院院长。任命公布后，进步师生对此十分愤慨，起而反对，彭迪先态度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支持许寿裳继任法商学院院长。他和法商学院教授曹靖华、韩幽桐、寸树声、沈志远、章友江等十几人联名发出快邮代电，公开反对伪教育部的无理决定，抗议并拒绝张伯海到任。当时地下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其他进步学生群起支持教师们的正义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潮。彭迪先和曹靖华被推选为教授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当面严词斥责当时主持校政的三青团干事长胡庶华，

使胡膛目结舌，无言可答。大长了进步师生的志气，大灭了反动分子的威风。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如临大敌，明目张胆地动用军警镇压，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并迫不及待地未到学年结束即解聘了这些进步教授。

1939年6月，彭迪先离开了陕西城固，回到成都。由于他在西北联大反对C·C派斗争的坚决态度，反动派不但解聘了他，而且把他列入黑名单。这使他回成都后竟然找不到地方教书，只好返眉山老家从事著述。学者竟然失了业！

这部经济史，启发人们思考未来

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给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先后兴起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有的人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已占优势；有的人却只根据地租占收获量的高比率而认为中国是纯粹的封建社会。如此等等，众说纷纭。彭迪先认为这表明了经济史的基本知识在知识界还是一个空白点。要认识社会性质就

缺少不了科学的经济史知识，而当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或译著多未能触及本质，有的甚至在为旧制度辩护。世界有名的巴捷尔、桑巴尔特、阿谢列、卡里弗森、韦伯尔等人，以及许多历史学派的学者究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唯心论的虚伪渺茫，机械论的死硬拘泥，独断论的顽固不化，个人主义的鲁滨逊荒岛奇谈等等，均是拿现象的说明来代替本质的分析，不能消化的死材料的堆集，对现存制度的歌功颂德。彭迪先认为，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的喧嚣，只能使人走入迷途。因此，写出一本有助于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史太有必要了！鉴于此，1939年下半年他利用失业在家的时间，撰写出三十万言的《世界经济史纲》^①。其终极目的在于启发人们正确思考中国的未来。

这本书是由生活书店出版，沈志远主编的《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是一部以唯物史观写出的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著作。它具

^①此书完稿后交付生活书店出版，但1940年7—8月间，因生活书店遭受国民党破坏而未能付印。直到1948年5月才在香港出版。

有以下特点：

(1) 它提高了读者对那时经济史著述中各种观点、方法的鉴别能力。本书一开头就专门详细评介了各种历史观，诸如自然条件的历史观、英雄论、第三史观（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并进而主张人口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因）、政治史观（又称权力学说或暴力学说）和唯心史观。然后运用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说明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可能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才有可能使历史研究上升到历史科学的水平。

(2) 它使读者能根据历史发展，了解现代世界经济形势，从而预见历史的明天。当时出版的经济史译著和著述多为一般概论，很少有包括分国别论述的著作，而且根本未涉及现阶段。本书不但专篇分析了各个社会经济形态，而且分篇详细探究了英、法、德、美、俄、日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基本特征，以帮助读者认识到各帝国主义国家是怎样在一般规律引导下，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间种种历史事变的前因后果又是